

揭秘

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,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,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“绑架”彭真事件,并组织公开批斗彭(真)、罗(瑞卿)、陆(定一)、杨(尚昆)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,但在随后,她也经历了人生浮沉。多年后,她作了如下回顾:

叶剑英之女回忆“文革”岁月

红卫兵与总理
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,那年,我25岁,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,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。文革大潮中,我亦难抵抗造反激情。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,不管是哪个派系,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,这个宗旨不变。大家都是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”、“头可断血可流,毛泽东思想不可丢”,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,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(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“造反派”组织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”的首脑,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“造反派”领袖)。

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,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,但目睹“造反派”种种破坏活动,无力制止,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,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,不能随便揪斗、处分干部。

1966年,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

卫兵。毛泽东号召“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。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,讲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,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,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,接受批判,并下了指令。学生都这样,指哪儿打哪儿,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,说应该做这件事。在这种号召之下,我们就做了。(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,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,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。乘门卫进屋看信之机,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,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,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。)

我们抓了彭、罗、陆3个人,除了杨尚昆,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。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。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。戚本禹说,“可能是叶向真,我们打听打听”。不到五分钟,他说是叶向真。

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,跟我要人。我们就和总理谈判。周总理看着我笑,他看着我长

大的,就问“你们怎么回事啊,把他们藏在哪儿了”?我们不说,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。总理就笑,说我们保证,帮你们开群众大会。他说:“你们看不住,如果有坏人捣乱,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,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”。

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,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,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。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,他们四个人都到了(公开批斗彭、罗、陆、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“黑帮”,轰动一时)。

1966年底,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“造反派”的围攻,陈毅首当其冲,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“检讨”。其后,“造反派”数次酝酿揪斗陈、叶,被周恩来出面制止。

1967年2月,父亲因“二月逆流”问题,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。

文革中被关押4年

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江青批示,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,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,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。

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,一切与外界隔绝。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。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,想着不管怎么着,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。结果越关越不对劲。两三个月后,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后来,我想干脆死了算了,都关了快两年了,看样子也出不去了,活着没意思。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。

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,试

验针灸。趁提审时,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,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,在水泥地上磨成针,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。后来,狱医给犯人看病时,无意间遗落两支针。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,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。

“九一三事件”后,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。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:“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,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……”

毛泽东说:“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!”由于周总理的提醒,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。然而,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,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,人也变得十分迟钝。

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,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。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,每天都只是傻傻地坐着。每当这种时候,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,比如“身体状况如何”,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,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话:“爸,是我不好,我害了您和全家。”听了我的话,父亲眼圈发红,眼睛湿润了,他说:“不是!是爸爸连累了你们。”幸运的是一年后,我身体基本恢复正常(1972年,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政行学医,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。实习结束后,她留在了这家医院,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)。

电影《原野》的沉浮

1978年,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,当了电影导演,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。

父亲希望我做中国的“米丘林”。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,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。但是,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。1960年,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。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。

在父亲看来,你要选择的职业,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,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。

20年后,我拍完电影《原野》,请父亲

看这部片子。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:“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。”

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,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。1980年,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,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·穆勒做了推荐。

马克·穆勒代表电影节将《原野》选入参赛片,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。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。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。

但获奖的《原野》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,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,但是,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“只能外销,禁止内销”片。

时隔7年之后,《原野》解禁。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,《原野》获得最佳故事片奖。1986年深秋,父亲因病逝世,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“平反”。《原野》之后,我又拍了《风吹唢呐声》和《三宝闹深圳》(1982年,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风吹唢呐声》,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,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“只准内销,禁止外销”,多种原因下,凌孜挥别影坛)。

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,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。对于我的文革经历,我不后悔,我也是受害者。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,真幼稚,但历史就是这样的,这是历史的产物。

据《看历史》

